

王宏志◎主编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翻译研究中心◎主办



STUDIES IN
TRANSLATION
HISTORY 2011

翻译史研究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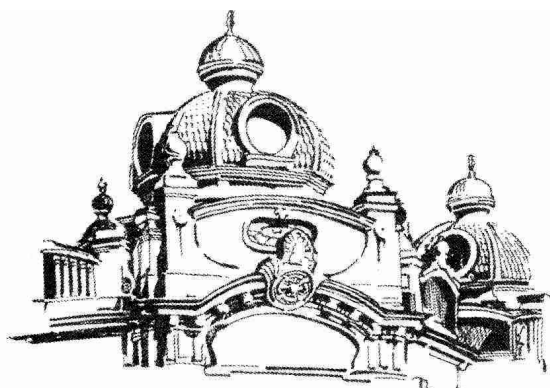
本书为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的学术论文集，以“翻译史研究”为专题，收录了众多学者在该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第一輯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翻譯研究中心 主辦



STUDIES IN
TRANSLATION
HISTORY 2011
翻译史研究 2011

王宏志 主编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史研究 第一辑(2011) / 王宏志主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309-07882-4

I. 翻… II. 王… III. 翻译-语言学史-研究 IV. H059-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2167 号

翻译史研究 第一辑(2011)

王宏志 主编

责任编辑/陈 军 余璐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1 字数 379 千

201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882-4/H·1621

定价: 4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翻译史研究

Studies in Translation History

主办单位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翻译研究中心

出版及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主 编

王宏志 WONG Wang Chi Lawrence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

副主编

关诗珮 KWAN Sze Pui Uganda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拼音排序)

陈思和 CHEN Sihe

复旦大学中文系

黄克武 HUANG Ko-wu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胡志德 Theodore D HUTERS

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亚洲语文及文化系

王德威 David Der-wei WANG

哈佛大学东亚文化研究系

王宏志 WONG Wang Chi Lawrence(召集人)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

王晓明 WANG Xiaoming

上海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邹振环 ZOU Zhenhuan

复旦大学历史系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拼音排序)

朱志瑜 CHU Chi Yu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

关诗珮 KWAN Sze Pui Uganda(执行)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

李奭学 LI Sher-shiueh

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斋藤希史 SAITO Mareshi

东京大学超域文化科学专攻

沈国威 SHEN Guowei

关西大学外国语学部

沈安德 James ST. ANDRÉ

曼彻斯特大学东亚系

王克非 WANG Kefei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

叶凯蒂 Catherine YEH

波士顿大学现代语言及比较文学系

出版助理

吕汇思 LUI Wui Sze

卷首语

《翻译史研究》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翻译研究中心所策划和编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学术性刊物。翻译研究中心成立于1971年,自1973年开始出版文学翻译刊物《译丛》(*Renditions*),一年两期,译介中国文学。《翻译史研究》为该中心出版之学术研究刊物,以中国翻译史作为专门的探研究对象,侧重个案研究,每年出版一辑。第一辑的出版,正值翻译研究中心成立40周年,亦可视为其中的一项纪念活动。

《翻译史研究》第一辑共收论文13篇,部分是特约邀稿,其余为外来投稿。外来稿件全经专家学者匿名审查,并提出严格修改要求。论文次序根据其研究主体的“历史位置”——即顺时序——编排。“译学新芽”栏目主要刊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每两年主办一次之“书写中国翻译史——中国译学新芽研讨会”中较优秀论文,也收录年轻学者的著作;本期所选文章,其中两篇来自第三届的研讨会(2008年)。“外国翻译史论文选译”栏目旨在介绍外国翻译史研究成果,每辑刊登三至四篇。

《翻译史研究》筹划至出版历时差不多两年,但仍难免错漏,恳请各方大家指正。

另外,《翻译史研究》园地公开,企盼慷慨赐稿,详情请参阅本辑末征稿启事。

王宏志

《翻译史研究》主编

香港中文大学

翻译研究中心主任

目 录

卷首语	王宏志	i
释道安翻译思想辨析	朱志瑜	1
黄金传说:高一志译述《天主圣教圣人行实》再探	李爽学	17
《火攻挈要》:晚明至晚清火器技术知识的转移	邹振环	55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译者	王宏志	82
严复与译词:科学	沈国威	114
哈葛德少男文学(boy literature)与林纾少年文学(juvenile literature):		
殖民主义与晚清中国国族观念的建立	关诗珮	138
清末女性空间开拓:薛绍徽编译《外国列女传》的动机与目的	钱南秀	170
 译学新芽		
家与国的抉择:晚清 <i>Robinson Crusoe</i> 诸译本中的伦理困境	崔文东	202
滇缅战役中的军事翻译	罗 天	223
“日丹诺夫主义”与 1950 年代上半期的中国文坛		
——以《译文》为例 (1953 年 7 月号—1956 年 3 月号)	崔 峰	250

外国翻译史论文选译

越南的“训读”和日本的“训读”

——“汉文文化圈”的多样性 岩月纯一(著) 刘桂芳(译) 292

对李树廷译《新约马可传福音书谚解》的文体之考察

——以汉字表记和汉语翻译为中心 金成恩(著) 刘桂芳(译) 302

翻译:对法西斯主义的威胁 克里斯托弗·朗德尔(著) 吴慧敏(译) 317

释道安翻译思想辨析

朱志瑜*

摘 要: 释道安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对中国佛学的传播和佛经翻译的演变影响重大。释僧佑《出三藏记集》中收录了道安十六篇与翻译有关的论述,本文选取集中讨论翻译问题的六篇,结合现代学者的观点,以“文质”和“格义”之辩为两条线索分析道安翻译思想的发展。史料显示,道安对这两个论题的立场似乎存在矛盾反复,后世学者对此持不同观点。本文认为,道安的翻译论述与其说是原则,不如说是对翻译现象的描写;种种不一致反映出他对佛经翻译的思考逐步深入,意识到当时僧人学者混淆翻译中的语言问题和文化问题。

关键词: 佛经翻译;释道安;中国翻译理论;文质;格义

Revisiting Shi Dao'an's Theory of Translation

Chu Chi Yu

Abstract: Being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scholars in Buddhist studies, Shi Dao'an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transl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in China. This paper discusses six most translation-relevant essays by Dao'an, trying to offer explanations of some of his seemingly inconsistent remarks on issues of translation. It focuses on his attitudes towards: (1) simple translation vs. sophisticated translation (*wen zhi*), and (2) "matching the meaning (*geyi*)". The "inconsistencies" of Dao'an's attitudes reflect his progres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sutra translation and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his ideal and actual practice. More than any of his contemporaries, Dao'an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issues in translation.

Key words: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Shi Dao'an; Chinese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simple translation and sophisticated translation; matching the meaning

* 朱志瑜,工作单位: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电邮地址:ctcychu@polyu.edu.hk。

东晋释道安(312—385)是中国佛学和佛经翻译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继承佛教最早的译者安世高传承的学说,通过自己多年的勤奋努力,建立了中国佛教第一个派别“本无宗”,并为佛教培养了大批弟子,后来他们散布全国,为佛教广泛传播莫下基础。道安取得的另一个成就是综理众经目录,把前朝遗留下来的众多经译散本编辑成目^①,标出译者、年代、译文优劣,使佛经从东汉传入中国以来至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374)二百年间,第一次有了正式系统的编目。道安在魏晋时期初步奠定的佛教研究基础,对后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整个佛经翻译史上,道安是讨论翻译最早、最多、最详的学者。可以说,他是中国佛学研究和翻译思想的奠基人。研究道安的佛经翻译思想对了解中国佛学早期发展、后来的传承、佛经翻译思想的发展演变和对后世的影响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道安生平及其著作

道安12岁出家,后(335至348)从西域高僧佛图澄学佛,由于形貌丑陋,不为师父器重,后来他以非凡的记忆和勤奋,赢得了师父的称许。佛图澄去世后,道安避战乱,一路颠沛流离到河北、山西、河南一带(所谓居河北),边宣教边读经,从者甚众。后来(364)应邀率弟子数百到襄阳弘法15年,并作众经目录。公元379年,前秦苻坚攻破襄阳,将道安带到长安,直至385年去世,其间主持译经。按照他个人经历来看,他的活动可以大致分为从师学佛期(约324—348;年12至36)、避乱期(348—364;年36至52)、襄阳期(364—379;年52至65)和长安期(379—385;年65至73去世)^②。前三期道安主要研究佛学,宣讲佛事,同时钻研佛经不同的译本,到长安以后才开始主持译场,直接参与译事活动。

中国佛经翻译思想主要集中在“文质”之辩和对翻译名义(包括“格义”)的讨论两个方面。从现存史料来看,道安对这两个论题的立场好像前后矛盾,多次反复。后代学者对此也提出不同的看法。研究道安的学者众多,除了古代流传下来的僧传、经录中有关道安的记录之外,近人论述较详者有汤用彤^③、吕澂^④、方立

① 原本已佚,释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二至卷五保留部分。释僧佑:《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页22-241。

② 各家对道安生平年代记录略有差异,但不大,最多一二年。

③ 汤用彤:《汤用彤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④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北京:中华书局,1979)。

天^①、任继愈^②、台湾王文颜^③、日人伊藤隆寿^④等。

道安著述丰富,和翻译有关的都收在经录中,释僧佑《出三藏记集》(1995)共收16篇,顺序基本按照写作时间先后排列,虽然也有一些小的出入:〈安般注序〉、〈阴持入经序〉、〈人本欲生经序〉、〈了本生死经序〉、〈十二门经序〉、〈大十二门经序〉、〈道行经序〉、〈合放光光赞略解序〉、〈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增一阿含经序〉、〈道地经序〉、〈十法句义经序〉、〈僧伽罗刹经序〉、〈阿毗曇序〉、〈鞞婆沙序〉、〈比丘大戒序〉。另有〈鼻奈耶经序〉收在大正藏卷二十四(No. 1464)。此外,据汤用彤,还有经录中注为未详作者的几篇文章,也出于道安手笔。

所有这些文章中真正比较详细讨论翻译问题的有以下六篇:

〈道行经序〉(年代不详)

〈合放光光赞略解序〉(襄阳期,376)

〈比丘大戒序〉(长安期,382)

〈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长安期,382)

〈阿毗曇序〉(长安期,383后)

〈鞞婆沙序〉(长安期,383后)

除〈道行经序〉外,其余写作年份基本可以确定。根据文章内容和与道安其他文章比较之后也可断定,〈道行经序〉应略早于〈合放光光赞略解序〉。说这六篇文章是按写作年代先后排列,大致不错。我们下面就按照这个顺序,主要集中于这六篇文章,结合现代学者的观点,讨论道安的翻译思想;过程中也参考道安其他的相关论述。

二、道安论“文质”

“文、质”是一对二元对立的观念,在古代用来说明翻译策略或方法,类似现代的“意译”、“直译”。“文”有时还用“华”、“饰”、“巧”、“曲”。从这几个字也可以推断出它含有华丽、间接、灵活的意思,和今天“意译”的特点相仿。“质”有时用“朴”、“质直”、“径达”;和“文”正相反,朴实、直接,接近所谓“直译”。在佛经翻译的理论中还有一个关于“烦简”的说法,也和“文质”相关。佛经原文繁复冗长,重复很多,一部经可以长达几千卷;汉语重简洁,将原文重复部分完全译成汉语不但增加翻译的负担,同时也为读者带来不便,因此很多译文大量删减原文。完整

① 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82)。

②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2卷。

③ 王文颜:《佛典汉译之研究》(台北:天华出版事业,1984)。

④ 伊藤隆寿(著)、肖平、杨金萍(译):《佛教中国化的批判性研究》(香港:经世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4)。

保留原文的译法(烦)称为“质”,删裁重复的译法(简)称为“文”。这是“文、质”和今天的术语“意译”、“直译”不尽相同的地方。总的来看,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术语定义为:“质”尽量贴近原文,和汉语保持一定的距离;“文”是译文取向的,迁就汉语的语言习惯。

〈道行经序〉

佛泥曰后,外国高士抄九十章为《道行品》。桓、灵之世,朔佛齋诣京师,译为汉文。因本顺旨,转音如已,敬顺圣言,了不加饰也。然经既抄撮,合成章指,音殊俗异,译人口传,自非三达,胡能一一得本缘故乎?于是《道行》颇有首尾隐者。古贤论之,往往有滞。仕行耻此,寻求其本,到于阆乃得。送诣仓垣,出为《放光品》。斥重省删,务令(令)婉便,若其悉文,将过三倍。善出无生,论空特(持)巧,传译如是,难为继矣。二家所出,足令大智焕尔阐幽。支谶全本,其亦应然。何者?抄经删削,所害必多,委本从圣,乃佛之至诚也。^①

道安这里讨论的是竺朔佛(亦称佛朔)主译(诵原文)、支谶传言(口译)的《道行》和朱仕行从于阆带回,无叉罗和竺叔兰译的《放光》;这两部经同为“般若经”,分别以“放光品”和“道行品”为首篇,即原文版本不同。原本道行经是“般若抄”^②。“抄”不是照抄,而是“抄撮”,即简本或节录,本来就不完整,汉文本虽然译得很好,但原文中删除的部分造成中国读者理解的困难(“首尾隐”、“有滞”)。因此朱仕行才从于阆找到完整的原本,由无、竺再译,即《放光》;这次是原文完整,而译文却有删节。道安先批评《道行》经原文不整,即使翻译得很好,前后总有空缺,中国读者也难了解^③。《放光》经原本完整,而译文只有原文的三分之一,道安却认为译本删除重复,抓住重点,突出了原意,这样的翻译是难以企及的。

二者同是删节本,道安的看法虽截然不同,但不矛盾,也不奇怪。究其原因,《道行》被删节的是原文,是原文抄经者遵照原文读者需要所作的删节,其结果对原文读者并不造成困难;但译成汉语后,尽管是全本(译者见到的全部),由于背景知识和思维习惯的差异,对汉语读者却造成不便。而《放光》的原文完整,删节乃译者根据汉语读者习惯所为,所以译文读者能更顺利理解译文。如果看道安对译

① 本文中引文虽加篇题,但只是节录,并非完整文章。释道安:《道行经序》,收释僧佑:《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页263-264。

② 任继愈认为《道行经》未必是《放光经》的节抄本,“很可能后者是以前者为基础发展来的”。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2卷,页166。释僧佑:《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收释僧佑:《出三藏记集》,页227。

③ 汤用彤说:“原文往往简略,剧中自由缺省,在西文已成习惯。译为中文,则极难了解”。汤用彤:《汤用彤集》,页148。

者删节本《放光》的态度,按照我们上边对文质的分析,他应该是文派(“简”属“文”),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合放光光赞略解序〉

〈放光〉,于阗沙门无叉罗执胡,竺叔兰为译,言少事约,删削重复,事事显炳,焕然易观也。而从约必有所遗,于天竺辞及腾,每大简焉。〈光赞〉,护公执胡本,聂承远笔受,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考其所出,事事周密耳。互相补益,所悟实多。恨其寝逸凉土九十一年,几至泯灭,乃达此邦也。斯经既残不具,并放光寻出大行华京,惠心居士翕然传焉。^①

〈放光〉和〈光赞〉就是根据上边说的朱仕行从于阗得到的般若经译出的两个不同版本。〈放光〉上边说过,是原文完整,译文简约的删译本。〈光赞〉是竺法护所译,是个完整全译本(原文全、译文全,但道安看到的是残本;放光九十品,而光赞仅存二十七品),比〈放光〉早出九年,但91年后才被道安看到(“恨其寝逸凉土九十一年”)。竺法护的译本以其“烦”(不删节)著称。“合放光光赞”的“合”是古代研究佛经的一种方法,称为“合本”,就是相互参照两个同本异译的文本,以一本为母(为正文),另一本为子(与正文所异之处以注的形式标出),合成一个版本。道安这里又赞扬〈放光〉删掉重复,原文旨意显焕,明白易懂;这和他上边〈道行经序〉的观点一致。但是他又说:简约之后毕竟有遗漏;就是说,“文饰”也有不足的一面。他认为〈光赞〉按照原文全译,没有删节装饰,但太过粗糙平淡(“质胜文”;孔子说:“质胜文则野”),反反复复,前后呼应,并没有突出要点。可是前后反复比照考证,用心体会,还是能给人更多的启发。

这两篇序言讲的都是“烦简”问题,就是为读者阅读方便,删削原文。道安的思想似乎有些矛盾。本来他认为如果不删削重复,只会给读者带来不便;后来发现,所谓“重复”,也不是毫无意义。我们可参照汤用彤对“重复”的论述:“佛经行文,比如剥蕉,章句层叠,而意义前后殊异,但骤观之,似全重复。但含义随文确有进展,读者乃不能不合前后,以求全旨”^②。这就是说,原文所谓“重复”,也不是简单重复,而是论述上层层递进。但对初学者来说,未必看出全部道理,所以也可能形成一种障碍。道安这时发现了全译的优点,他看出了“烦”有“烦”的好处(普通僧人未必看得到),这是他对以前单方面主张删削重复的修正。

王文颜认为道安的翻译思想以建元十八年(382)为分水岭。在此之前,他坚持“五失本、三不易”(详下)的原则^③,是文派,此后有所改变。问题是上边这两篇

① 释道安:〈合放光光赞略解序〉,收释僧佑:《出三藏记集》,页265-267。

②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页148。

③ 王文颜:《佛典汉译之研究》,页212-213。

文章虽写于建元十八年之前,但那时,道安还没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说法(当然这不是否认他当时已有这些思想)。烦简各有优劣,这道理本来很明显。道安开始接触一部经的时候,为了理解其中含义,繁杂重复的译文必然带来很多困难;而当他深入研究之后,也会发现简约的译本虽然易明,但终究不能完全彰显细微的玄奥。这两篇文章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变化。烦简不能一概而论。道安的困惑不难理解:他面对三个译本,却没有一个是完整的:《道行》原文不全,《放光》译文不全,《光赞》虽是全译本,但保存不全(“既残不具”)。他可能意识到了不同(水平)的读者,对译本的烦简有不同的要求:初学者简约本易明,但是他自己却渴望得到全本。

以上是道安自己研习佛经的心得,还谈不上对翻译的论述;到了长安主持译场之后,他才对翻译有了更直接的体会。

〈比丘大戒序〉

昔从武遂法,潜得一部戒,其言烦直,意常恨之。而今侍戒规矩与同,犹如合符,出门应轍也,然后乃知淡乎无味,乃直道味也。而嫌其丁宁,文多反复称,即命慧常,令斥重去复。常乃避席谓:“大不宜尔!戒犹礼也,礼执而不诵,重先制也,慎举止也。戒乃径广长舌相三达心制,八辈圣士珍之宝之,师师相付,一言乖本,有逐无赦。外国持律,其事实尔。此土《尚书》及与《河》,《洛》,其文朴质,无敢措手,明祇先王之法言尔慎神命也。何至佛戒,圣贤所贵,而可改之以从方言乎?恐失四依不严之教也。与其巧便,宁守雅正,译胡为秦,东教之事犹或非之,愿不刊削以从饰也。”众咸称善。于是按胡文书,惟有言倒,时从顺耳。……诸出为秦言,便约不烦者,皆葡萄酒之被水者也。^①

这篇文章写于道安晚年,在长安主持译场时期。他在译此经之前见过一个译本,译得太繁、太直,不喜欢。而在他主持下翻译出来的结果仍然如此,这使他悟出,淡而无味才是真正的味道;但仍觉得太繁琐,于是叫助手慧常删节。慧常引中国经典中语言简朴的《尚书》、《河图》、《洛书》为例,指出圣贤的话不应该随便删节。众在座也都支持慧常,于是道安就没坚持自己的意见。

这里反映的翻译思想和前边两篇明显不同。开始时道安根据以往经验,也是为初学者着想,主张删繁就简,但很快改变了立场。王文颜认为道安“入长安之前,他完全以‘五失本、三不易’为衡量译本优劣的准则”^②,而到了长安以后,“接

① 释道安:《比丘大戒序》,收释僧佑:《出三藏记集》,页412-414。

② 王文颜:《佛典汉译之研究》,页213。

触梵本,参与译经”,逐渐改变了对译经的看法^①。然而光看这一篇,道安是主张全译的。但是我认为,道安这时大概意识到了他们翻译的是戒律,如同法律。如果说道安前面看到了译文读者的需要,这里他看到了不同类型对翻译策略的要求。他开始发现简本的缺陷,所以发出“葡萄酒被水”的感叹。

〈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

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般若经》三达之心,复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前人出经,支谶、世高,审得胡本难系者也;叉罗、支越,斫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穷成而混沌终矣。^②

这是道安讨论翻译最详、最重要的一篇。梁启超说“要之翻译文学程式,成为学界一问题,自安公始也。”^③钱锺书也说“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④这篇提到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直接涉及翻译方法。“五失本”是翻译时的五种失真情况。第一,“胡语尽倒,而使从秦”;梵文和汉语最大的区别是动宾倒装,即宾语置于动词之前(如早期僧名“护法”称“法护”,“念佛”是“佛念”),译成汉语时,这一特点没有保留。上文〈比丘大戒序〉中说的“惟有言倒时从顺耳”说的就是把“倒”装的语序“顺”过来。第二,“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佛经语言简朴,汉语,特别是魏晋时期,趋向华丽,根据读者的喜好,华丽的译文容易受到大众的欢迎;这也是和原文不符的地方。我们上边说过,佛经重复很多,这里三、四、五条说的都是如何处理重复(当然不是简单的重复;“委悉”:详尽周密)的问题。“义说(复述小结前文的韵语)”很像汉诗的“乱辞(结尾总结性的韵语)”,在大意上可以说是重复(“文无以异”)。“反腾前辞”是一段终了之前,再次总结全文旨要。这些在翻译的时候,一概删除,所以“失本”。“三不易”说的是译

① 王文颜:《佛典汉译之研究》,页216。王文颜对道安翻译思想能转变的观点和吕澂的论述最为接近。见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页58-62。

② 释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收释僧佑:《出三藏记集》,页290。

③ 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收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页60。

④ 钱锺书:《翻译术开宗明义》,同上,页28。

经的困难。一,佛的时代和今天不同,要令今人完全了解佛的实践活动和思想,几乎不可能;二,圣人的智慧岂是一般俗人可以理解;三,佛去世后,他那具备六大神通的弟子汇集整理佛经时都小心翼翼,唯恐扭曲佛的原意,我们凡夫俗子怎么可能面面俱到呢?

历来学者对“五失本”众说纷纭,有说是原则的,有说是标准的,也有说是方法的。原则和标准区别不大,都是规定性的条款,要求译者遵守。方法可以说是描写的,也可以说是译文结果。问题是道安到底赞成“五失本”,还是反对“五失本”。道安的后继者有如下论述:

[竺佛]念乃学通内外,才辩多奇。常疑西域言繁质,谓此土好华,每存莹饰,文句减其繁长。安公、赵郎[赵正,见下文]之所深疾,穷校考订,务存典骨。既方俗不同,许其五失胡本,出此以外,毫不可差。^①

这段引自《僧伽罗刹集经后记》,收入《出三藏记集》,可知去道安不远,作者佚名,估计也是道安弟子。竺佛念代表当时的文派,主张按汉俗去重复,增文饰。但是道安和赵正反对,仅“许其五失胡本,出此之外,毫不可差”。但这可是真的矛盾了。这里的焦点在是否“减其繁长”。如果把“五失本”当作原则,那么,“五失本”的后三项都是“去重复”的。道安“许其五失胡本”,就是让他“去重复”。这和竺佛念的初衷不是一样吗?为什么这位作者认为竺佛念一开始没有遵照道安的原则呢?

道安弟子释僧叡在道安去世后,协助鸠摩罗什译经。罗什在佛经翻译史上被称为文派,主要因为他的译文简。僧叡在罗什译场担任笔受,以下是他当时译场的纪录:

执笔之际,三惟亡师“五失”及“三不易”之诲,则忧惧交怀,惕焉若厉。虽复履薄临深,未足喻也。幸冀宗匠通鉴,文虽左右,而旨不违中。遂谨受案译,敢当此任。^②

僧叡牢记道安的教导,小心翼翼,生怕背离原文。他也是把“五失”、“三不易”当作“质论”(直译论)的原则,对罗什“文”的译法初存疑虑。后来看到罗什的译文虽然用词和原文不完全相符,但主旨不差,这才放心。

这两段引文说明,道安的这一提法在当时是当作“质论”来理解的,即认为道安反对“五失本”。僧叡在另一篇文中还说:“烦而不简者,贵其事也。质而不丽

① 佚名:《僧伽罗刹集经后记》,收释僧佑:《出三藏记集》,页374-375。

② 释僧叡:《小品经序》,同上,页292。